

首次国共合作时期 广东革命史

何锦洲 蔡明禁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首次国共合作时期 广东革命史

何锦洲 蔡明禁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粤] 新登字 12 号

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革命史

何锦洲 蔡明禁著

责任编辑：黄善芳

*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路·邮码 510641)

* 华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3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623—0718—0

K·5 定价：5.00元

前　　言

首次国共合作时期，确定国共合作的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广东是全国革命根据地，是首次国共合作建立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极其重要地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太雷、杨殷、陈延年、邓中夏、彭湃、苏兆征、罗登贤、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叶挺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斗争。他们开展了蓬勃勃勃的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使这里爆发了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胜利地进行了东征、南征和北伐战争，促进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团结，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迅猛发展，给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永耀光辉的篇章。

探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革命史对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有启迪的，是有益的。本此目的，我们撰写了这本书，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与不足之处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何锦洲　蔡明禁
1994年1月6日

目 录

前言	(1)
一、确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广东的建立	(1)
(一) 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三大”	(1)
(二) 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8)
(三) 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13)
(四) 平定商团叛乱	(19)
(五) 第一次东征	(22)
(六) 平定杨刘叛乱	(24)
(七) 第二次东征以及南征	(26)
(八) 国共合作后的斗争	(29)
二、广东工人运动	(39)
(一) 广州沙面大罢工	(39)
(二) 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二劳大”	(46)
(三) 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48)
(四) 工会统一运动	(63)
(五) 同英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69)
(六) 创办最早培训工运干部的劳动学院	(70)
(七) 北伐时期的工人运动	(74)
(八) 大革命时期华南职工运动的特点	(81)

三、广东农民运动	(85)
(一) 广东农民运动的初步兴起	(85)
(二) 广州历届农讲所的创办历程	(94)
(三) 广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105)
(四) 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	(115)

一、确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广东的建立

（一）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首次确定的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了我国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党的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刘尔崧等三十多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

三大召开前夕，党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包括下述几个问题：一、党的策略；二、党纲；三、土地问题；四、工会如何进行宣传；五、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六、解决北平（北京）、汉口和广州党组织中的一些矛盾问题；七、党的议事规程和选举中央委员会^①。

“三大”开幕的第一天，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他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原设在上海，因受反动派迫害，到北京，又遭猖獗的反动派迫害，所以迁到广

① 格鲁宁：《为争取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州，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现在，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已出版了周刊。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目前“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①陈独秀在报告中对各地区工作指责很多。他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②“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③他唯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工作得很好。”^④这就说明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及湖南同志工作成绩是异常显者的，因而是受到大会唯一表扬的地区。他在报告中还批评了“张国焘思想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最大的错误。”^⑤陈独秀作报告后，有些同志批评他的报告非常悲观，有右倾情绪。

大会的第二天，各省代表汇报各地工作概况。瞿秋白、刘仁静汇报了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概况。张国焘、陈潭秋、孙云鹏等就筹备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二七”大罢工善后工作处理情况作了汇报。随后，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其中有毛泽东同东就湘区工人运动及反帝反军阀斗争情况作了发言。谭平山同志介绍了广东革命运动概况。最后，大会通过有关国共合作、工农运动等决议案，选举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三大”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共两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

① ②③④⑤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列宁早已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实行压迫和掠夺，不能不损害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个阶段和某一个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底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但不要和他们合流起来，必须无条件地保持甚至在最萌芽的形式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底独立性。”^①为此，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初期，就开始与国民党联系，酝酿合作。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并通过了我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问题作出决议，指出：“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在民族革命战线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的特殊的旗帜。”这一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由莫斯科到中国，向中共中央提议提前召开党的“三大”，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以确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因此，“三大”召开时，代表们就国共合作问题，展开讨论。他们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在“三大”召开前已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以孙中山为首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即广东革命政府），这时并不禁止工农革命运动，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内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并且废除了不

①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79页

合理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压制工人罢工的刑律。因此，“三大”肯定了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是国民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代表们都表示，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三大”经过几天的争论，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的“左”的错误倾向，因为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实际上是反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大会也不同意陈独秀等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这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不懂得应以主要注意力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七个决议案，三个章程和一个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是由陈独秀草拟初稿的。这个决议案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讨论时，张国焘曾提议：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工人运动既是中共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①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多数代表否决了。据外国一位历史学家考证，陈独秀起草的上述决议案，在表决时，以二十一票赞成，十六票反对，获得大会通过^②。这个决议案指出：目前，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应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95页。

② 格鲁宁：《为争取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该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现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革命的党”；我国“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共产党。在《关于党员加入政界的决议案》中指出：“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在工人运动决议案提出，目前职工运动应提出男女工资平等；废除未满14岁的童工；反对中间剥削的包工制等口号，以发动男女工人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青年运动决议中提出：青年运动是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对青年应给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以发动青年投入反帝反军阀战斗。在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在妇运中应加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等口号，以发动“占国民半数的”妇女参加革命运动。在《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为达到“政治的独立奋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章程》中指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在两大会之间为党最高指挥机关”。在党章中指出：“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意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工人、农民、工商业家等各阶级的苦痛与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一刻不能忘记忽略的；在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更“是我们

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①。

在“三大”开幕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被本国反动派逮捕。“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致电日本共产党慰问被捕同志》的决议，并通过共产国际转送给日本共产党。这时，爪哇（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又被本国敌人抓去坐牢。到会代表立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送给共产国际转交爪哇共产党。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声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当讨论党纲时，因时间不足，大会决议将瞿秋白起草，经陈独秀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作为底稿”并通过各地党组织讨论后，“尽快于 1924 年 1 月前，将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②

“三大”决议案通过后，陈独秀又提出：凡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的影响。”^③大会通过这个提案。随后，党中央任命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任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书记。

① “三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及宣言，存中央档案馆。

②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后面附言，存中央档案馆。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

“三大”通过决议案后，选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等为中央委员，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中央局，委员有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以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兼负责组织，罗章龙任会计兼负责宣传。蔡和森负责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后，代表们到黄花岗祭扫七十二烈士墓，高唱《国际歌》。“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既指导了华南地区的革命运动，又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潮。到1923年9月初，党中央机关才从广州迁到上海。这时，党中央决定：谭平山留任驻粤中央委员；王荷波加入中央局为委员，负责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史上是有伟大功绩的。它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使党能够在南方广阔地区公开地充分地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投入革命斗争，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潮，使我党能够日益发挥其为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三大”正确地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使我党能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而大大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当“三大”通过国共合作决议后，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毅然决定，国民党和新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合作，表明他是以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主。这就极

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因此，我们肯定地说，“三大”提出的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正确的，对国共两党，对国家、对中华民族都有利。

“三大”提出的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不仅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对尔后的革命战斗也起了有益的启迪。特别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它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把敌人赶出我国神圣领土，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它为我党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作了有益的启示。建国后，它为我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提供良好的借鉴。它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促进了我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现在，中国共产党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建立新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对国共两党、对我们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对我国各族人民都十分有利。这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深信，在大力促进台湾与祖国大陆，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革命统一战线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的统一怀抱。我们一定要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三大”所确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将永耀光芒。

（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23年12月25日，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

发出第13号通告，指出：国民党改组已进行，有振作的希望，广州已设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上海执行部亦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明年1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孙中山指派三人；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即将共产党和非党同志可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和何人可以负责，速报中共中央，以便和国民党联系，派人去成立国民党分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青年团与国民党应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协助改组国民党和组织国民党地方委员会；在国民党“一大”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代表选出后，即应报告国民党中央（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旅费由总部发给，国民党一大，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草案可见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对于时局的策略；代表出发前，均应在各区详加讨论；代表路过上海时，我党的代表“再集中决议一致的主张”。

当时，有个别共产党员不赞成国共合作。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李达说：“我对于国民革命是赞成的，但对于以整个（共产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却是反对，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欠缺，不如索性解散这个组织，专干国民革命。所以十二年（1923年）秋，我也就退出了共产党”^①。当时，即使有个别共产党员退党，中共中央仍按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三大”决议实行，毫不动摇地促进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① 李达：《中国所需要之革命》。

为了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0月2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每省选代表六人，召开日期初定1924年1月5日（后因故延至1月20日），地点在广州市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现文明路鲁迅博物馆）；议决出版党务周刊，推选谢英伯为编辑主任，谭平山、陈树人为撰述，林黄卷为经理主任，关于中央委员分工，议决“主席临时推定，书记谭平山、财政邓泽如”；关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孙中山指定廖仲恺到上海，召集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伦、戴季陶等五人组成；关于国民党改组宣言，推定谢英伯、谭平山起草，杨庶堪修改。国民党党纲、党章和大会宣言草案，孙中山聘请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再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讨论修改，最后由孙中山审定，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56人^①。国民党出席大会的有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森等，占代表总数的80%。共产党参加大会的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罗迈（李维汉）、夏曦、王尽美、廖乾五、刘伯垂、韩麟符等，占代表总数的20%^②，陈独秀是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但因事，到时没有出席。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没有组织，一些代表由共产党地方组织提名，经中共中央报国民党，孙中山同意后出席。湖北代表廖乾五、刘伯垂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

① 范体仁：《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记》

②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7月1日。

的。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主持大会的主席团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大会还决定：宣言审查委员会由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守常（大钊）、恩克巴图、叶楚伦、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九人任员；审查党务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刘芦隐任委员；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由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伦、李大钊、冯自由、黄泳台、黄右公、刘成禺、白云梯九人为委员。谭平山、谢持、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斋青、李大钊、肖佛成、汪精卫、何世桢、丁惟汾、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等19人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到国共合作时，是有争论的。国民党中央有人提出，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国民党老右派冯自由，不服从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发表谬论，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联俄、联共。孙中山通知要把冯自由开除出党。他号召国民党员要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认为这是党的最高原则，任何党员，违反这个原则，要受党纪处分。柏烈武是国民党老党员，对孙中山提出的改组国民党不表明态度，有异议。孙中山在会上要柏烈武明确表态，承认错误。柏烈武接受批评，检讨了错误，才保留党籍。少数国民党员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后面”，指手划脚。他还说：“你们如果再反对我，我就下令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好了”^①！为了排除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孙中山把

^① 叶蠖生：《现代中国革命史话》